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 42

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下） [瑞典]喜仁龙 / 著 沈弘 聂书江 / 编译



三 原序 二* 三

促使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原因就是北京城门的美，北京城门对其他美景的映衬作用以及对破败城壕、青翠古松和古老建筑的衬托装饰作用。不管是从地理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看，北京的城门与城墙既是北京的地标，也反映了北京城的伟大历史。北京的城门和其周围环境，一起组成了独具特色的美丽风景。

为此，我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光，专门对北京的城门进行了研究，试图通过一幅幅照片来体现城门的美。有 109 张凹版照片被挑选出来呈现在这本书里；这个目的最终能不能达到，还需要读者的检验。

在研究北京城门的艺术风格时，我逐渐产生了一种新思路，那就是通过探究北京城门的歷史意义，来进一步研究它的建造史和历史变迁。同时，城门周围的环境和城墙也引起了极大的兴趣。随着研究的深入，就越能体会出这些城门和城墙所提供的历史线索。关于这个，本书涉及不多，然而，仅凭那一点片段，读者也能够认识到以下两个内容：（1）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与中国历史息息相关；（2）尽管一些城门得到了重修，但是整体上它们依然是中国古代历史和岁月的遗迹。

本书的史料大部分来自于地方志，除此之外，就是镶嵌在城墙和城门上的那些被收集起来，并被用于史学研究和考古研究的碑记和印文。不过，所有这些资料都仅仅用于建筑技术和结构上的分析。在缺少其他文献资料的背景下，它们理所当然成为本书参考的主要材料。

当然，本书也受到如下限制：（1）没有建筑材料的鉴定；（2）不能对城墙进行考古挖掘或者在其之上设立脚手架进行观察。还好，本书可以借用本地绘图员绘制的城门及其建筑的实测图，它们都是研究北京城门和中国建筑最珍贵的史料。北京城门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代表。

本人在写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其中，本书的中文材料是培华女学校的包哲

*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现为本书第 6—7 卷内容）1924 年初版序言。（译者注）



洁（A.G. Bowden-Smith）及其助手翻译，文责由她负责。

文中的碑记和砖文内容是周谷城记录，翻译是英国公使馆的司各脱负责。

尤其是体乐，不但亲自介绍本地绘图员，而且还在其他方面给予了无私的实际帮助。

曾经主持前门改造工程的建筑师罗克格提供了前门箭楼的测绘图和平面图，在此一并感谢。

英国皇家建筑学会的籍捕先生为本书中一些有关建筑方面的说明进行了校阅，在此感谢。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于遇到的中文词汇和名称应该一一标出的，但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未能完成。还好，牛津大学东方学院的叶守瑶先生把重要的词汇编辑成表，从而弥补了未能收录汉字说明的缺点。

文中汉译英部分基本上依据韦氏拼音，当然也有一些偏差。另外，中文中的复合名词使用大写字母也是值得商榷之处。尽管如此，我深信，本书对于读者而言，还是很好理解的。

总之，希望本书所付出的努力，能够为中国语言和历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如果能够引起读者诸君对北京城门和城墙更深的兴趣，且本书能够反映出它们的各种美，并能够为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尽了所谓的一点绵薄之力的话，那么，我就感到很满足了。

喜仁龙

1924年5月于巴黎

三 第六卷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三



中国北方城墙城市概述



尽管长城举世闻名，但是，人们依然仅把它看成一个历史遗迹、一个古代帝王满足自己欲望的产物，并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即破乱不堪的长城如同其他建筑一样，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很明显，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在中国，长城是为数不多的得以一直保护的建筑遗迹之一，几百年来，虽屡遭破坏，但又屡经修缮和翻建。直到近些年，长城作为边界及防御工事的存在，其重要性都不可小视。实际上，它最大的价值体现为：长城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围墙式构筑物永恒信赖的象征。

城墙比其他任何建筑更能反映中国人的基本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城市的框架就是由一道道墙垣围成的，正是城墙把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地段和场院。在北方，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城墙。在中文中，“城市”和“城墙”是用同一个字“城”来表示的，因为在北方几乎不存在没有城墙的城市。一个居民区，无论它规模多大、地位多重要、治理得多好，只要没有确定其范围的城墙，那么，这个居民区就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以上海为例，这一现代中国重要的商业中心，在传统中国人眼里就不是“城”，只能说是一个由渔村发展起来的居住地或商埠。同理，其他几个未筑城墙的新兴商埠，也不能称为“城”或城市了。

墙也是中国城市最坚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除了省城和县城，中国每一个居住区，甚至一个小村庄，都筑有墙垣。在北方，无论历史长短和人口多少，每一个村庄都筑有一道土墙或类似土墙的墙围。一个地方无论如何贫困、偏僻，房屋如何简陋，庙宇如何残破，道路如何肮脏、泥泞，都会有一个围墙之类的建筑，而且现在看来，这种地方的墙体保存得非常完整。在西北，一些地方深受战争和饥饿蹂躏，人们的房屋全部倒塌，但是，其城墙却依然坚挺如故，相比其他的城市建筑物，它们历经火灾和洗劫而不倒。在一片凋敝、荒凉之中，这些幸存下来的城墙显得格外醒目，成为过去辉煌的见证。

这些建筑大多选址于城沟之上或旷野之中，但是，与其他房屋和庙宇相比，那些裸露

表皮的城墙、墩台及城楼，却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当年的繁荣和辉煌。有一些城墙的历史很短，但是，那些裸露的墙体表面和断裂的雉堞却给人以沧桑之感。即便是整修，样式和大小改变的也不多。北方的很多乡镇都会建筑一些土城墙，如果这些城镇未能建成，则这些建筑就会废弃或建筑成茅草屋。

谈及中国北方的城墙城市，可以以陕西省的西安府及山东省的青州府为例。14世纪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陕西修建西安府。该城为方形，位于黄土高原之上，从北面或西面都可以看到绵延的城墙。当人们走近时，西安府的双重城楼、方形墩台和巨大角楼就能够一览无余。各种建筑物中的线条与形体之间的完美协调明显可见，整体上给人以沉稳凝重之感。西安府犹如一座要塞，俯瞰着黄土高原，雄踞于地平线之上。

青州城与西安城相比，明显缺乏雄伟壮观之气，更多的是城墙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风景独好。其周围被良田和果园环绕，树木给灰蒙蒙的城墙增加了些许绿色。城墙顺着一条清澈溪流曲折延伸，从而使得河岸呈不规则平面，一些砖石地面根据地势的高低拾级而上，自然得体，有如天成。城墙被巨大的扶垛加固，雄壮高耸，墙头上长满灌木树丛，垛口上这些灌木的枝条攀附缠绕。穿过西城外的石桥，踏上曲折的石头小路，河岸上由各种石头堆砌的一层层平台和一级级阶梯都被树木笼罩，极富自然野趣。这种景象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使人不由得想起意大利北部的城堡，而不像置身于中国城镇之中了。

穿过较为冷清的城门时，呈现于眼前的，并非喧闹的街市和各种各样的民居，而是一片开阔地，对此你会感到吃惊。青州府的西城和南城几乎都是一片片农田和菜园，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供人建房了。但是，西安府的西城、北城和东城却有很多空地，甚至还有供鸭子和乌龟游弋的水塘。这些古代城市可以追溯到明代甚至明代以前，只是近百年来遭受了兵灾而毁坏。城市面积在缩小，但是人口却在增加，因此，居民的密度便不得不增加，人们的居住也就越来越拥挤，有的人不得不在城外搭建茅屋，这也是一种廉价的解决办法。但是，也有一些问题：由于商业的需要、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及政策的改变，一些地方，如山西的太原府，甚至开始兴建最新款式的建筑。但是，这些新式的建筑都非常粗糙，以至于缺乏田园风情的美好景致。

实际上，中国北方很多城市的破败和萎缩与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紧密相关。实际上，目前的这些状况不利于古城的保护。非常不幸的是，当战争动乱，以及劫掠、火灾和饥荒侵袭了一个城市之后，由于没有责任心和资金，当局几乎没有为恢复原貌做出过努力。那些遗留下来的城市居民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新建的半洋房里。南京、西安、洛阳等古城是发生上述变化最突出的城市。战乱之后，这些闻名遐迩的古城已经看不到昔日的辉煌，只留下穷困的身影。当然，规模更小的城市更是如此，早已经颓败不堪。这种恶劣趋势不仅仅表现在面积的缩小上面，还表现在建筑质量的低劣程度上。

北方建筑中具有建筑学研究价值的并不多。尽管有一些精美的庙宇殿堂，但严格地说，它们不能列为建筑艺术上的精品，尤其是近年来的建筑。用建筑学的眼光来看，比较有价值的是一些外形有些怪诞、风格独特的石塔和砖塔，以及迄今屹立在古城中央的钟楼、鼓楼——这些高大的鼓楼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城中这些不起眼的建筑几乎都是用红漆染得木梁木柱作为骨架，并用青砖砌成的小屋。在商业街区，很多店面都是面向街面的廊房。在较富裕的城市，有些店面外装饰一些精美的雕刻和华丽的招牌；在贫穷的小县城，大多使用最为常见的砖石水泥，雕刻彩饰的店面几乎没有。这跟中华民国成立后大肆使用砖石水泥有关。自从“华丽的天朝上国”变成民国，传统文化中的彩绘艺术便快速枯萎了。

城市中住宅区的外貌令人感到单调而乏味。人们通常只能看到掩映在房屋周围的树梢和高矮大小不一的屋顶，房屋的其他部分则完全被院墙遮挡，难以窥见内部结构。这种院墙都是用青砖砌成的，有的表面涂上一层灰泥，呈暗红色，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风吹日晒，往往变色。在这些墙壁上，除了简单的门口或由几级台阶和鞍状小屋顶建成的小门廊外，没有任何别的间隔和装饰，可见建筑风格之简单。

只有在进入一座四合院，绕过所谓的“影壁”之后，才能发现内部的美。在北方，一个大家庭一般都拥有两个或者三个庭院。第一个庭院由石砖铺成，有三面排列的低矮房屋。第二个院子是一座拥有水池、假山、亭阁的花园，住宅的规模和重要性决定着花园的考究程度。第三个是大小不同但样式一样的住宅。住宅位于庭院后部的地基上，住宅的前部是一道开敞前廊，由两侧突出的墙壁和立于其间的一排柱子构成。屋顶为鞍形，且高大弯曲，一直延伸到前廊顶部，屋檐位于立柱之上，檐下雕有彩饰的斗拱。宅内墙壁的式样不一样，主宅的正面骨架是由支撑横梁的立柱构成的，位于多柱子之间，下部由砖砌成，上部做成格子窗，格子窗上裱有一层透明纸。屋前有一条宽阔的石路，一直延伸到台基上，堂屋的正门雕饰有能够通气透光的孔道，上面同样也蒙有一层透明纸。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建筑上的色彩：很多砖瓦结构的建筑用的都是灰色，而木结构都用朱漆。为了显示更好的效果，它们门上的雕饰选择的都是镀金。如果建筑物规制宏大，则斗拱部分就会装饰为孔雀色或青蓝色。这种对于色调对比的运用带来了很好的远观效果，尤其是当建筑物处于绿叶扶疏、花木掩映的背景中时，这种色彩会使得建筑颇为悦目。但由于装饰物并不精致，所以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然而，城镇商业区的情景与居民区不同。整体而言，商业区比居民区更加活泼和吸引人。商业区的房子一般不会隐藏在墙壁后面，而是会面向大街开放，房屋的窗户一般也都是由玻璃构成。屋顶跟住宅的一样高，但是没有木柱支撑。店面窄小，因此，支撑屋檐的檩木必须架在两侧突出的山墙上以便能够获得支撑力。有的店铺门口还盖有倾斜的小屋檐。在炎热的夏季，店铺前还会盖上用苇席竹架做成的凉棚。如果商业街面窄小，这种凉棚还会

一直延伸到对面的铺面上，或者至少也要遮盖住人行道。实际上，这些商店占据街道的面积比行人占据的多得多。在铺面精美的粮米铺前面，很多店员和小贩做着各种买卖，有时，这种店铺的街面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西安府有一条每天早上都进行粮食交易的、满是粮店的街道，每天都会有推车的、挑粮担的等各种商贩顾客，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经常导致后来者无法前行。商店的后面有很多老式的小房屋，主要是供老板和店员吃饭、睡觉、抽烟、喝茶之用。其实，从外面就能够看到店铺与住宅的区别。

但是，由于习俗、繁荣程度和经营品种的差异，店铺与店铺之间无论是从外观上还是从内部摆设上，都有很大不同。例如，粮食店与药店、首饰店或者茶叶店截然不同。实际上，人们从外在装饰上就能够分辨出这些店铺的经营情况。描述这些细节有些偏题太远，更何况我们只是讨论中国街道的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保存最好的是古城中的牌楼。在北京的商业区，牌楼随处可见。但是，最近几年，随着水泥建筑的发展，古城牌楼也在减少。牌楼一般高于屋脊，竖立在店铺的前面，结构为几根高高的牌楼柱，中间横接一些枋木，枋木上用多铺斗拱承托着一层或二层的楼檐。楼檐下面制作成华板，华板上雕饰人物像或浮雕、镂空雕的花卉图案，中间则是镶嵌商店字号的匾额，华板底部雕各种复杂的装饰图案，就像是牌楼的花边口。所有这些雕饰都用金色，但也有用其他颜色的。此外，从牌楼柱伸出的夔龙挑头上面还悬挂着幌子，幌子装饰有色彩斑斓的花边和流苏。

街道两旁林立着雕刻彩绘的牌楼的场景，想必蔚为壮观大气。现在，这样的店铺牌楼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一二百年前，这种两旁矗立店铺牌楼的街道随处可见，如今都是水泥建筑，缺乏装饰品，因此，除了竖立一块醒目的招牌外，水泥建筑就没有其他的饰物了。这样，作为一个建筑群体，北方的街道就不如古代由熙攘的人群、川流的车辆所构成的街道场景那么热闹吸引人了。尽管水泥建筑也会有几株古朴的大树环绕其中，从而显得生机盎然，但是这种景象缺乏建筑艺术的特色。

尽管街道的情况大体如此，但是对于雕刻装饰的各种纪念物、纪念碑、拱门和配楼的情况而言，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那种横跨街道。牌楼存在的意义一般是为了纪念当地的名人或大事件，但是人们更愿意欣赏不同寻常的装饰品。牌楼大多染成鲜红色，除此之外，金色、绿色、蓝色等装饰物也会雕刻其中。关于立柱的多少，主要看牌楼本身的大小和重要性，既有四柱、八柱，也有十二柱。底部以夹杆石承托。木柱与木柱之间一般横跨着两三根宽阔的枋木，枋木之间则由华板和刻有颂辞的牌匾隔开。每一间牌楼的顶部都有多铺斗拱支托的飞檐挑出，飞檐上覆盖着青蓝色和孔雀绿的琉璃瓦。楼檐垂脊上装饰有仙人像和脊兽。这些牌楼一般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显著特点，如支柱、弯曲楼檐、额枋、华板及各种彩色等。

牌楼大多为木建筑，除楼檐垂脊上的人兽等饰品外，其他装饰部分会根据建材性质的特殊要求进行筛选。从结构上看，石牌楼几乎是按照木牌楼样式仿造的，而且是更适用于木结构而不是石结构的方法，这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建筑方式。这种情况与日本的牌楼情况极为相似，日本的石牌坊也呈现出由木结构到石建筑的转变。当然，在类似楼檐和斗拱等一些部件中，也存在变化，如浮雕额枋、夹杆石加固的牌楼柱等。尽管自明代以来，在结构和装饰部件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各个楼牌结构之间还是会存在一些细微差异的。其实，寺院是比街道更适合保护楼牌的地方，寺院里有更多更古老的楼牌，但是没有发现明朝以前的建筑。山东潍县有很多美丽的街景牌楼。据发现，该县城主街道上有六座三间三檐的高大牌楼，大多建成于清朝乾隆年间。这六座牌楼并非都横跨街道，那几个构成某些庙院或衙门入口的楼牌一般都坐落在街道的空地上，楼牌的职能就是显摆某地或某人的地位和尊贵。

一些古代城市还会在市中心建造鼓楼和钟楼。这样，一些主要的街道不得不从这些建筑周围绕行而过，有时也会从其下面穿行。连接着拱门的是宽阔的基座，下面是供行人通过的隧道。但是，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下面的人行道几乎都拥堵不堪。它们的主体部分则是建在与城墙同高的砖砌基座上面，一般都是一幢二层或三层的巨大楼阁，一般为木结构，但是，梁柱之间需要砖石填充，楼体下面有回廊，最上面两檐之间则是精粗不一的“散斗”，承接着挑出的弯曲屋顶。

由于修建年代和重要性不同，这些建筑的结构和装饰细部也有很多差别。但一般而言，它们对建筑物总体效果的影响难以企及高耸的楼阁和雄大的基座。在过去，钟楼、鼓楼这类建筑都被称为“台”。古代，人们建筑用于不同目的和形式不一的“台”，如黄金台、观象台、瞭敌台等。如果一个城市中的房子有这样的建筑，那么那些本来低矮的房子会顿时让人感觉高大起来，整个建筑结构也古朴、庄严起来。

除了上面提到的钟楼、鼓楼外，还有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建筑，即宝塔。宝塔的修筑往往与佛家寺庙有关，而那些最精美的佛寺一般都选址在风光秀美的城外而不是市中心。由于宗教的需要，宝塔与宝塔之间在始建年代、材料性质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要指出它们的共同点其实很难。如果非要说共同点，可以归纳为：塔的底座为正方形或多角形，高从50尺到350尺之间，分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层不等，年代久远一点的塔基本上都是砖石材质，后来的也有木制的，还有一些铁制的。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中，宝塔一般都具有很好的“风水”，因此，它们大多成为当地的重要界标，甚至是一种吉祥平安的象征。在北方，这种塔基本上都在郊区，而不像杭州、苏州等南方城市建在市区，否则它就会给人一种异端宗教的怪诞之感。在北方的环境和年代久远气氛的衬托下，实际上，这些塔比一些天主教的建筑要顺眼得多，很多天主教堂在一片低矮的旧房子面前显得

非常突兀和冷漠，而且也很不协调。

尽管在表面上中国北方的城市大多无甚差别，甚至让人索然无味，但其内部结构却给人以复杂多样甚至扑朔迷离的感觉，因为里面古迹众多，令人赞叹。例如在一些不像街道的胡同里，极有可能隐匿着古老建筑或其他濒于毁灭的古迹零碎部分，而这些隐藏的建筑古迹才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东西，一般市民并不能发现它们，普通的游客也仅仅是浮光掠影。我们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城墙和城门，也不会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此，因此，本书主要是大概描述它们的外状而已。整体看来，中国的城市中或多或少掩映在弯曲屋顶之下的低矮房屋和城壁给人的印象最深。

俯瞰全城，人们发现整个城市都被一片灰暗的瓦砖覆盖。在春暖花开的春季，一些树木长高超过屋顶，从而给这片灰暗的颜色增加了绿色，但是一到冬天，树木又开始凋谢，只留下灰白的树干，从而映衬着屋顶一片灰暗和光秃。薄薄的白雪覆盖着树干、屋脊和房檐，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当晨雾笼罩整个城市时，北京城就像进入了寒冷的灰蒙蒙的大海洋，虽然波涛起伏的海浪依然可辨，但是波浪的流动却已停止。难道这片大海被那让中国古代文明生命力窒息的寒魔所震慑？这凝固的大海能否在下一个春天里再次融化获得新生？生命还会不会携带美丽和欢乐而苏醒过来？人们还能否看到人类新生力量的波涛冲破那古老中国的残垣断壁？抑或内在动力已经凝固，灵魂已遭永远冻结？

清晨的雾气慢慢消散，眼前的幻景也渐渐消失，这时，立于城头之上的士兵吹响军号，向街上发抖的人们宣告，民国十一年又一个劳碌的日子开始了。



北京旧址古城



尽管本书研究的是北京现存的城墙和城门，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对历史上出现的城墙进行陈述。关于这些城市的城墙，元明时期有丰富的史料记载，在《顺天府志》中可以查询到大部分记录。全书凡一百三十卷的《顺天府志》是一部刊行于万历年间（1593年）、1885年修订再版的有关京师及京畿名胜、历史沿革、名迹、教化等方面的地方志。由于缺乏校对和统筹，里面有很多错误，比如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录，有时候就会出现前后矛盾。例如，第一卷中关于北京城墙的记载就迥异于第二卷。所以在引用的时候，我们秉持更审慎严肃的态度。

本书主要参考《顺天府志》前两卷和贝勒（Bretschneider）医生的历史研究著作（1876年在上海以英文版问世，1879年法文版在巴黎发行）。同时，对散见于《日下旧闻考》（初纂于1658年，后于1744年重刊）中的有关记载也予以特别的注意。

中国史学家们表明，现今北京所在的地方旧时叫蓟。蓟城是当时蓟州最重要的城镇。史料显示，公元前2400多年的舜帝时，蓟就已经成为城镇。那时蓟城位于今天北京城的西北，史书形容它“固若金汤”。公元前727年，蓟城成为战国燕国的首都，公元前221年为秦军所毁。西汉时期，它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

东汉时期（约公元70年左右），一个名为燕的新城在蓟城以南约十里处建成，三国时燕改称为“幽州”。公元936年，燕被契丹人占领。在此之前，唐朝曾经在那里派驻了一支由胡人将领统率的强大军队。当契丹人占领此地并建立辽后，发现幽州就像一个县城，实际太小，不符合都城规制。于是，契丹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建了一个更大的新城，大肆向幽州的南面和西面扩张。因为辽在北地已经建有一个都城，相较于北都城，此新城就命名为“南京”，又被称为“燕京”。

贝勒医生曾经亲自沿着燕京的南墙和西界进行调查，从而确定了燕京西南角的位置，也就是在今天琉璃厂的西边。《顺天府志》曾经引用《辽史·地理志》的记载，琉璃厂曾出土一方墓志称此地为燕京东门外的“海王村”，而燕京的北墙大约与内城的南墙位置基本一致。

文献显示，燕京为方形，城墙周长为36里，高30尺，宽15尺，城墙上建有城门和供射箭使用的楼橹。燕京城有八门，每一方位两门：东为安东门、迎春门；南为开阳门、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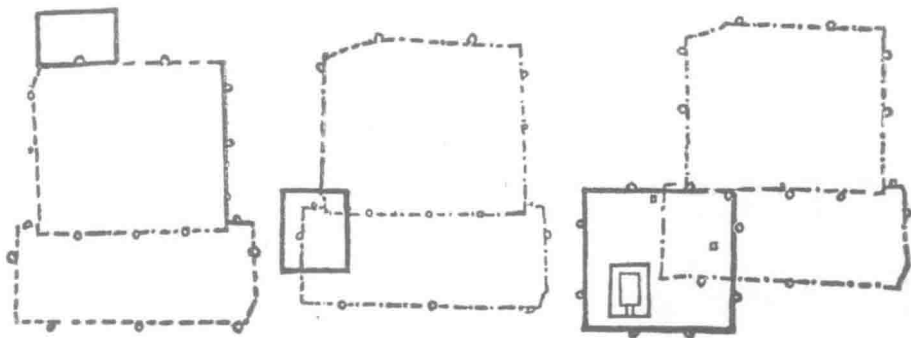
凤门；西为显西门、清晋门；北为通天门、拱辰门。

辽朝的宫殿位于燕京的西南部，也是长方形，有二重围墙。

据《顺天府志》记载，当辽被金国灭亡后（1125年），燕京城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无法对这些记载进行验证，尤其是对有冲突的地方进行考证。但是，其中一些记载城市建设的文献还是值得注意的：“金太祖天会三年（1125年），宗望取燕山府。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墉堑悉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廩甲杖库，各穿複道，与内城通。时陈王兀室及韩常，笑其过计。忠献王曰：‘百年间当以吾言为信’”。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宗望（太宗）皇帝曾经在燕京城内修筑过一个环形围墙或军械库。未过几年，及至海陵王统治时期（1149—1160年），对包括宫殿在内的燕京又进行了扩建。

另外还有如下记载：“及海陵王立（1149—1160年），有志都燕，而一时上书者争言燕京形胜。梁汉臣曰：‘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何卜年曰：‘燕京地广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天德三年（1151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养浩等增广燕城，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灏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遂以燕为中都，府曰大兴，定京邑焉。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其正门旁又皆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旁两门焉。周围二十七里，楼壁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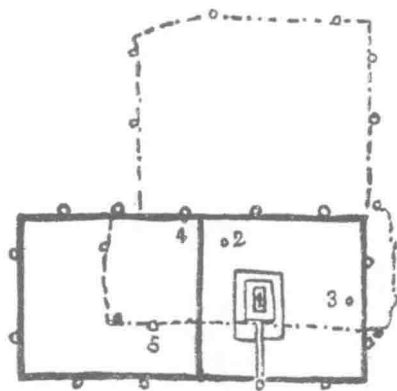


早期城市相对于北京城址的位置示意图
左为蓟城，中为燕（幽州），右为燕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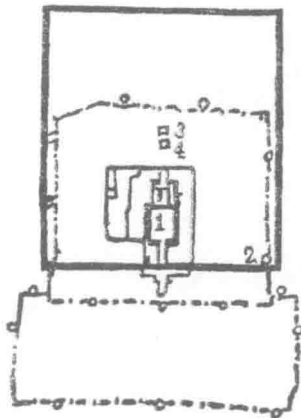
这段文字表明，燕京的周长比整个城墙长，从而不适用城墙。据记载，仅旧城部分的长度就达 36 里。如果涉及新扩建部分，那么，这个数据到底是指不包括旧城墙的新建城墙，还是全部包括，如今已不可考。但是，该书还记载，全城周长为 75 里。实际上，这个数字不是夸大了成分就是记载错误。明朝曾经对南墙进行了救命测量（原来的金中都），其周长大约为 53280 尺（约为 30 里）。由于此时旧城已经不存在，故而金中都的确切大小几乎无可推算，但可以肯定的是，“辽金故都当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其东北隅约当与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又考元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元年赴开平，三月五日发燕京，宿通玄北郭”。由此可证明金中都在今北京城西南。据一些碑刻记载，那些位居北京西部和南部的寺庙，如白云观、天宁寺、土地庙等，都包含在金中都城范围之内。由此可知，旧燕京位于中都城之内，中都城后来延伸至现北京旧城以西约四里处，东边延伸到现在的东便门附近。中都南墙沿用旧燕京南墙，大约在内城以南二里半处；北墙位于北京内城南墙以北约一里处。如果这些推断都正确的话，那么金中都城墙统共长度为 54 里。

金中都的城墙基本上都是用几十里外人工运输而来的墙土建筑而成的。史料记载：“筑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州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

“至卫绍王时（1209—1213 年），蒙古军至。乃命富室迁入东子城，百官入南子城；



金中都



元大都

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万。大兴尹乌陵、用章命京畿诸将毁各桥梁，瓦石悉运入四城，往来以舟渡；运不及者，投之于水。拆近城民屋为薪，纳之城中。蒙古兵攻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击之。蒙古兵凡比岁再攻，不能克……”

1213年，金中都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命令。

此后，金朝皇帝对北方便失去了控制，随后，将帝国迁往汴梁，而汴梁是宋朝迁都杭州前的都城。1215年，蒙古军队第三次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后，皇宫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月，大批官民被杀，城区基本被毁。“明初，金宫遗址犹存。嘉靖筑外城（1554年）后，遗迹始渐湮灭。”1260年，蒙古可汗忽必烈打算恢复中都的规模，但是，由于忽必烈忙于征战，该计划一直未能实施。

《顺天府志》记载：“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修燕京旧城。至元元年（1264年），都中都。四年（1267年），始于中都之北建今城而迁都。九年（1272年），改大都。城方六十里。”

占领中都后，忽必烈意识到中都城文化很发达，资源也很丰富，过去蒙古首都和林（今乌兰巴托西南方）已经不适合作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1267年或1268年，蒙古开始新建中都，史称“大都”或者“汗八里”：“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贵高及有官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塌。”明代以前，建筑基本上未使用砖瓦，因此，元大都的城墙都是把土置于篱笆或苇栅之间，通过夯打结实而形成墙壁。

大都城址在“中都之北”。《顺天府志》记载：“至元四年（1267年），筑新城，城方六十里……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大都达今安定门、德胜门（今北二门）外，其时围有城墙。”如果今天以北京北约五里处的遗留土城为元大都城墙遗址的话，那么，元大都北墙的位置和距离也就有了答案。元代文献中还曾提到元大都北墙于1368年收缩了五里。《顺天府志》记载：“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这段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这说明新建的北墙曾经新建有两座与旧墙门相对应的城门，另外七门则保留在原来位置上。《顺天府志》还引自《元志》肯定了新建北墙的位置：“元之都城视金之旧城拓而东北。至明初改筑，乃缩其东西迤北之半而小之。今德胜门外有故土城阬，隆然坟起，隐隐曲抱如环不绝，传为北城遗址。”这段记载非常明白无误地告知了元大都及其两门的变化情况。

据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元大都的南墙、东墙与明代城墙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墙

址大体一致，平则门和齐化门甚至连名字都未变，和义门与崇仁门则改名为西直门和东直门。从北边城墙变化的记录中可知，如果南墙和东墙发生变化，也会被记录下来。元大都南墙墙址与明代的南墙还有点不一致，元大都南墙实际上是旧时金中都北边城墙。金中都的城墙遗址到了元代依然存在，那时候人们称其为“南城”。前面提到的白云观等就位于金中都城内，但是，如果金中都北墙不在如今北京内城北墙北边一里处，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产生。据《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记载，元在兴建大都时曾下令在庆寿寺以南三十步远处修建南墙。另外，根据记载，原位于元大都城东南角的观象台被发现在今天北京城东南城角以北约一里半处的东墙上。由此可知，元大都的南墙很可能与金都北墙重合，具体是按照过去内城南墙以北大约一里或一里半处修筑而成的，至15世纪初永乐帝时，南墙的位置才发生变动。而北墙则是在朱元璋时改变的，从下一章所引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具体解释。

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对元大都进行了营建和重修。《顺天府志》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修大都城。二十一年（1284年）五月丙午，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1292年和1322年又连续得到整修，“至正十九年（1359年）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这个时候的大都，城门还没有被看成永久性军事设施，其原因可能是元朝主要借用了辽金人的“楼橹”。但是，这时候的城门开始建造弧形围墙的瓮城。明代以前，护城河的桥都是木制的而不是石造的。

实际上，元大都的面积比现存的北京内城大得多，但是，也没有《元史》所说的周长为60公里，实际可能是50公里。这些史书有些夸大成分，记载也不够真实。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夸张地说：“此城之广袤，说如下方，周围有24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6哩。”马可·波罗的家乡意大利的一哩相当于2.77里，以此推算，全城超过66公里。这个数字明显与事实不符。而且，马可·波罗指出的正方形也不准确，而应该是长方形。马可·波罗为了赞扬元大都的雄伟壮丽，就不得不选择夸张。但是，他的描述也有一些可取之处，尤其是对元大都的街道和建筑的描写。关于城墙和城门，他写道：“（此城）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马可·波罗记载了城墙的倾斜度问题，实际上确实很大，城墙的外表也并未用砖包砌，因此，建筑师不得不采用大坡度。但是，在记述城门时，马可·波罗并没有准确记录：“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颇壮丽。四面各有十二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壮丽相等。宫中有殿广大，其中贮藏守城者之兵杖。”事实上，只有三面城墙有三个门，第四面城墙有两个门，全城共十一座城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宫”的建筑，大概就是现在的城门楼和角楼。这是一种木构架的砖结构建筑，其四面都有廊，屋檐有三层并向外挑出。由于鼓楼是根据前代样式仿建的，因此，元代的城门楼和角楼都采用这种形制。这种建筑风格的延续性可通过研究现存建筑而获得关于过去的知识。由此，可以断定的是汗八里的城楼与明

代城楼基本相似，但元代瓮城是否配有箭楼等这样的细节，就不一定能确定了。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还记载了汗八里的布局和街道的一些特征：“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屋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以方地赐各部落首领，每首领各有其赐地。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也就是说，整个元大都非常有规划，横平竖直，街道笔直而纵横交错，从而把各个城区划分为不同的方块形。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很多京城都具有类似的现象，尤其是隋唐的长安，这种严肃完整的规划达到了极致。我们可以从长安的地方志中发现，整个长安也被横平竖直的街道划分为不同的地区，整个城市就像一张棋盘，每一个被划分的小方格叫作“坊”，每个坊又被街道划为四个很小的方块。对于大户人家而言，其一座府第或一所衙署就占据整整一个坊，普通人家只能占据一个坊的四分之一。传说元大都的每一坊占据8亩（约1.25—15英亩）的面积也被一户人家所有，这个面积大小足以容纳一所豪华的大宅，甚至可以包括好几重院落和花园。如今人们已经很难确定元大都到底对于这种方块结构实现到何种程度，但一定会具备纵横交错、井然有序的坊巷结构。不过，马可·波罗所说的元大都整个布局像棋盘的说法还是与现实略有不同的，由于地理、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元大都的城市布局也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而且，随着战争、动乱和其他天灾人祸的频繁发生，这些不规范之处越来越多。很多建筑规划不再严肃认真，很多小街道也修得宽短不一，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横平竖直了，不过元大都整体布局还是能够辨认清楚的。实际上，欧洲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房屋密集、街巷曲窄，与之相比，长安和元大都的平面设计更加接近于现代城市。这些中国城市面积宽广，居民房屋低矮，树木和花园比比皆是。

马可·波罗曾提到元大都有一种自带庭院和花园的大屋，但是，由于他认为这些房屋人人皆知，因此不必进一步描绘。正如他所说，人们确实能够通过这些府邸管窥中国古代庭院的布局，但是，如果研究内部的结构、庭院的进数和花园的规模等，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马可·波罗唯一特别提到的元大都建筑就是钟楼，他说：“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产妇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纵许行者，亦须携灯火而出。每城门命千人执兵把守。把守者，非有所畏也，盖因君王驻蹕于此，礼应如是，且不欲盗贼损害城中一物也。”

由于城市边界的扩建，现存的钟鼓楼已经不在城市的中心，但是，古代钟鼓楼的位置印证了马可·波罗的记述。前面已述，元大都城曾向北拓展大约五里，南墙又向北移动一里多，如果考虑变动，就可发现马可·波罗描述的钟鼓楼位置恰好在元大都的中央，而其他城市的钟楼也是这样。此外，《元一统志》《元史·地理志》中有“至元九年（1272年），